

《近代教育家传编委会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陈奎

云南民族出版社

《科学与人》杂志丛书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云南民族出版社

陈云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责任编辑：刘 凡 李昭伦

封面设计：肖生勇 何永健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蒲圻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字数：474,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装49,000册

精装1,000册

统一书号：11184·27 定价：(平)2.5元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董纯才
主任委员 王惠平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有盛	王捷南	毕全忠	庄家龄
李仁主	余章瑞	张秀翔	陈兴贵
陈 浩	秦新民	龚达发	蒋涵箴
雷克啸			

出版说明

一、本书选择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中国现代教育家，约请研究专家及部分记者、作家，将这些教育家的事迹撰写成传。选择的标准是：在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发展起过重大贡献者。本书所记述的内容真实可靠，很多资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系统介绍各教育家的教学实践及理论观点。本书可供现代史工作者、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及广大教育工作者作工作参考书，亦可供师范院校学生作课外参考书。本书在写作上力求生动形象，具有文学价值。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得到历史知识，学习教育家们的动人事迹和治学、成才的经验。

二、本书分四至五册出版，每册三十多万字。全书各教育家传收入的次序按接稿及编辑完毕的时间先后排列。同一册中则按教育家出生年月先后排列次序。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全体编写人员受到很大鼓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谷城教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并为本书写了序言。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教育界很多前辈及全国很多单位、部门、地方的同志的热情支持与指教，我们谨表示深切感谢。

四、由于编者理论水平及历史知识有限，且限于其他条件，本书编辑工作上缺点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月

序

自一九一九年起到今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五年，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教育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代表，他们的贡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宝贵财富。搜集他们的事迹，给他们立传，使他们昭著于世，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看一看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就会发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教育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教育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好几位是教师；“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重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北京大学、黄埔军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在中国革命中更是占有突出的地位；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文化战士都曾从事过教育工作，有些人同时就是杰出的教育家；很多职业革命家是从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批职业革命家成为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史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我们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非常不够，至今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较系统、叙述较全面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专著。编写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特点，将会在提供线索、搜集资料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无疑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今天，发展教育事业对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的重要作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解决教育问题列为四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这是十分英明的决策。跟一些工业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事业还比较落后，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着新的任务，要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进行改革，加速发展。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科学

DAF 35/12

理论的指导。然而，我国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我们的一些教育实践、措施，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依据，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很多失误。可以说，教育科学理论研究的落后，反过来成了造成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理论研究落后不等于没有理论。“五·四”运动至今，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各种建设人才，也培养出了不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这里就有许多的成功经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我们不少教育家在教育理论方面也作了许多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问题是，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比较分散，散见于他们各自的实践、经历之中，缺乏综合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现在，在选择一批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理论上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搜集、整理他们的事迹和教育理论观点，编成他们的传记，这一工作，对于研究、建立我国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计划收入一百位左右教育家的传，分册出版。至于选择标准，本书编者提出如下的意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工作者，考虑收入。此外，材料搜集的范围、评价、编写的体例等方面，为条件所限，暂不十分苛求。相信这样作仍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希望它的出版，对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能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

周谷城

目 录

蔡元培	1
陈嘉庚	37
徐特立	60
黄炎培	91
王瑶卿	111
叶圣陶	126
杨石先	192
成仿吾	210
杨秀峰	224
潘 菽	249
周谷城	266
陶淑范	284
王 力	306
孙敬修	322
苏步青	341
董纯才	358
王企贤	379
段力佩	391
斯 霞	414
韩作黎	432
韦 力	445

蔡元培

高平叔

家世及所受旧教育



蔡元培先生，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庵，后改号子民。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①

父亲宝煜，曾任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在他十一岁时去世了。母亲周氏，典衣质物，抚养他兄弟三人。长兄蔡元汾，后在上海崇实石印局任职；三弟元坚，后在绍兴钱庄业中任职。

六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及《神童诗》等书。父亲去世后，无力延聘塾师，一八七七年秋起，附学于他处。

十三岁至十六岁，受业于同县秀才王懋修，并得到叔父蔡铭恩的指导，阅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定训通声》等经史典籍，学作八股文。

十七岁考中秀才后，即自由阅览，有关考据或词章的书，均随意检读。十八岁至十九岁，在当地充塾师，设馆教书。二十岁至二十二岁，为同乡徐氏“古越藏书楼”校订其所刻图书，因得博览其丰富的藏书，学乃大进。

二十三岁，赴杭州，应乡试，中举人。二十四岁，去北京，应会试，告捷；②二十六岁，再去北京，补复试，在保和殿应殿试，被取为第二甲

①辛亥革命后，废府，山阴与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

②会试告捷后，为何延至两年后始补复试，据蒋复璁说：蔡元培应试后，以所作文送请他乡试时主考官李文田一阅，李认为这篇“怪八股”不合乎科举，难望获中，遂匆匆离京返里。詎知揭晓时却名登榜上，但已来不及赶回参加殿试，不得不推迟至壬辰科补应殿试。（蒋复璁：《蔡元培先生的旧学及其他》，见《传记文学》第184期，1977年9月台湾出版）

第三十四名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岁，应散馆考试，授职翰林院编修。

在翰林院数年中，大量阅读书籍报纸杂志，开始涉猎译自外国文的论文、专著，旁及自然科学。开始学习日文。他那时在京寓书斋中，写有“都无作官意（张籍），惟有读书声”十个大字，①概括了他在翰林院期间的况味。

主持绍郡中西学堂

一八九五年，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蔡元培极为悲愤，说：“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疆臣跋扈，政府闾茸，外内狼狽，虚疑恫喝，以成场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苦流涕长太息者也。”②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后，他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维新的失败，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同时，经过在北京几年的体验与观察，他看清了清廷腐朽不堪，“无可希望”。于是，这年九月，断然弃官出都，南下兴办教育。

回绍兴后，就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总理（即校长），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的起始。这个学堂是用地方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三斋，略如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他所聘请的教员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荃、薛闻轩、马水臣等，授数学及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等，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这“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外国语课程，原有英文、法文两种，他又增开日文课，聘日本人中川到校任教。为使学生有从事科学实验的机会，加强直观教学的效果，他还设法购置了一批物理、化学、生物的仪器、标本及教具。

该学堂当时的第一斋小学生蒋梦麟有过这样一段回忆：“顾名思义，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得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

①蔡元培：《杂记》手稿

②蔡元培：《杂记》手稿

对记忆中的旧观念则弃如敝屣。”^①

该学堂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马涓菴、杜亚泉等笃信进化论，对旧时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等旧习，随时加以纠正，引起旧派忌恨，怂恿学堂董妄加干涉，蔡元培愤而辞职。

从他给该学堂董徐树兰的辞职信中，可以看出他坚持办学宗旨和不畏暴政的态度。他说：“若曰将为之避祸也，则元培固不畏祸。元培近得炼心之要……凡所见闻，返之吾益民益世之心而安，则虽阻之以白刃而必行；返之吾心而不安，则虽迫之以白刃而不从。”“元培所理者，学堂而已……元培之宗旨如此。有与元培同志而不畏祸者，共事可也。教习而畏祸也者，辞职可也。学生而畏祸也者，告退可也。绅董而畏祸也者，绝交而勿干与焉可也。虽然，前年之垫款，今年之用费，度非元培所能办也……又有一上策焉，曰元培辞总理之责而已。此事也，于学堂有三益：曰大改宗旨，可以免祸，一也；凡元培所订教习，有不愜于绅董意者，元培既去，悉可解约，二也；元培以挥霍名，今既去矣，可以力反所为，节用而持久，三也。……即以今日为元培卸总理之期可也。”^②

他在主持中西学堂期间，还手订《绍兴府学堂学友约》五条，^③征集同志，编辑教科书，以解决教材问题^④。他还撰写《绍兴推广学堂议》，主张绍属八县筹集公款，在府城设立高级、中级学堂各一处，在各县各设初级学堂一处^⑤。希图能以绍郡为起点，开始推广新式的学校教育。

辞职后，他就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曾到院讲学数次，宣传科学的有用，劝学员就性之所近，分别研求；但该院经费困难，无法改进，任职一年，就辞掉了^⑥。同一时期，诸暨县的丽泽书院，也聘他为院长，但未曾前往就职，仅劝其将书院改为学校。^⑦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间，他曾去临安，为绍兴侨农创设一小学。又到杭州，与陈介石等建议创设师范学堂，以培养师资，但无结果。这时期，他还起草一份《浙江筹办学堂节略》，建议：于省城立师范学堂一，

①蒋梦麟：《西湖》，香港学风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②蔡元培1900年2月26日《致徐树兰函》手稿

③中西学堂随即改称绍兴府学堂

④⑤据《浙江省立绍兴中学五十周年史稿》，绍兴鲁迅博物馆所藏资料

⑥⑦蔡元培：《写自年谱》手稿

立高等学堂一，立中学堂一，立小学堂、蒙学堂若干；于各府城，各设中学堂一，设小学堂、蒙学堂若干；于各县城，各设小学堂一，设蒙学堂若干；于各乡，各设蒙学堂若干。并建议由丁漕平余及货捐以及限制迎神赛费等来筹措教育经费。①希图由此而能在浙江全省推广新式学校教育。

与此同时，他广泛搜集、阅读各种教育书刊，对教育制度及学校课程详加研究，撰写出《学堂教科论》一书。他把各种学术归纳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及道学三大类而详加论列；制定普通、专门、实业各种学级及不同课，并制定女子普通学级及师范速成科的学目。②这一研究工作，为他此后筹画全国教育大计预报了初步的设想。

倡办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

一九〇一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刘葆良任澄衷学堂的总理。一个月后，刘介绍他去南洋公学任教。

当时，南洋公学新设一特班，招生三十余人，授以英文及政治、理财等学，以备迨后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被聘为特班总教习，负指导学生之责。其指导之法，手写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的书目。门类为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哲学、论理、伦理、文学、科学，等等。每一学生自认一门或两门，依书目阅读，规定每天写札记，手自批改。每月命题作文一篇，亦手自批改。每晚招两、三学生谈话，或发问，或要求口读书心得，或自述对时事的感想。他还教学生学日文，指导学生练习由日文译为中文。此外，鼓励学生练习演讲，并说国语，以培养鼓动群众的能力。他着重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例如，所出作文题，即为《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加以评论》之类。③

他在南洋公学任教期间，一面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荟我国自己之节度，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胪举而博译之”④一面又和蒋智由、叶浩吾等组设中国教育会，宣传民族、民主的思想，他被推为会长。

①蔡元培：《浙江筹办学堂节略》手稿

②蔡元培：《学堂教科论》，上海普通学书室1901年10月出版

③蔡元培：《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手稿；并参阅黄炎培：《敬悼吾师蔡子民先生》，见重庆《大公报》1940年3月24日

④蔡元培：《创办外交报叙例》手稿

这时期，他的元配夫人王昭已病故一年多，为他做媒的人络绎不绝。他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所有推荐的对象，无一合格，而且，他所提的第四条和第五条，在当时社会风气下，许多媒人都被吓跑了。但为时不久，即偶然发现黄仲玉不曾缠足，能书善画；因父老家贫，卖画来抚养弟、妹，维持家计；并在父病时，割下自己臂上的肉来煎药，治愈了父亲的重病。蔡元培闻悉这些情况，就托人说合亲事，于一九〇二年元旦，在杭州与黄仲玉结婚。

一九〇二年秋，他由日本考察归国，正值南洋公学爆发学生退学风潮。经过是，该校第五班学生因误置墨水瓶于课桌，被教员斥责，同学不平，要求公学总理撤换这个教员，不但不准，反欲惩戒学生，激起广大学生退学的风潮，特班生亦相率退学声援。蔡元培同情学生，向公学当局力争，无效，也愤而辞职。他将退学学生二百余人介绍与中国教育会，该会决定募款援助，创设爱国学社，公推蔡元培为总理，主持其事。

爱国学社“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分寻常、高等两级，各为二年。寻常级授修身、算学、理科、国文、历史、地理、英文、体操等课，由高等级学生中公举若干人任教员；高等级授伦理、论理、算学、物理、化学、国文、心理、社会、国家、政治、法理、经济、日文、英文、体操等课，由中国教育会会员中公举若干人任教员。①

为了激发社会上一般群众的爱国热情，蔡元培与爱国学社师生在张园举行演说会。该社还组织义勇队（后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军事训练，以响应留日学生的抗俄行动。该社还与《苏报》订约，每日由蔡元培、章炳麟、吴敦恒等七人轮流为该报撰写评论，鼓吹革命。

不久，爱国学社脱离中国教育会，宣告独立；但教育会负责人员中，对这一问题意见不一，争执甚烈。蔡元培遂辞去该社与该会职务，赴青岛学习德语，准备出国留学。

他在青岛时，“苏报案”发生，章炳麟、邹容等人入狱，爱国学社停办。他回上海后，一面按捕房规定时间按月前往租界监狱探视章、邹，一

*蔡元培：《自写年谱》手稿

①参阅《爱国学社章程》，见《政艺丛书》卷12

面与陈竞全、王小徐、汪允宗等组织对俄同志会，出版《俄事警闻》（后改称《警钟》日报），利用当时俄军在东北侵略行径引起各方注意的时机，以报道俄事为名，实际鼓吹革命。他曾在该报发表《新年梦》小说一篇，表达了他想把每个国民“糜费在家中的力量充公，”从而“造个新中国”的愿望。^①

一九〇四年暑期，他重任爱国女学总理。^②那时，他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③对该校年长的女生，除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以灌输革命思想外，由锺宪鬯等以较多课时讲授理化，为炼制炸弹、用暗杀手段进行革命作准备。

这年冬季，龚宝铨等由日本回上海，同他洽商组织光复会，推他为会长。那时，陶成章等在浙江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各府，联络各处会党，准备行动。绍兴一带，另有一派会党，由徐锡麟统率。两派各不相谋。蔡元培邀约陶、徐两人到上海恳谈，促使浙东两派革命会党合作，均加入光复会，待机起事。^④

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何海樵由日到沪，介绍他入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派他为同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主盟员）。他还加入何海樵等组织的暗杀小组，与杨笃生、苏凤初、孙少侯等秘密赁屋，试制炸弹，想用暗杀清廷大臣的手段来进行革命。

一九〇六年春，秋瑾等人在绍兴，建议设立学务公所，以推进绍属八县的教育事业。蔡元培被催促回乡，出任该公所的总理。先设一师范传习所，讲授教育上所需要的各种科学。当筹办师范学校、筹款遭到阻挠时，他便辞职去上海。

①见《俄事警闻》1904年2月17～20日、24～25日

②1902年冬，蔡元培与蒋智由、黄宗仰、林白水等人创办爱国女学于上海登贤里，由罗迦陵捐款相助。初推蒋智由任总理；不久，蒋赴日本，改推蔡元培继任。1903年5月，他往青岛时，爱国女学总理之职，也一并辞去。

③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宇宙风》第55期（1937年12月出版）

④1905年，秋瑾由日本到上海，由陶成章介绍，到爱国女学与蔡元培洽谈。她回绍兴后，加入光复会

这年秋天，他听说清廷打算派送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即去北京。等待期间，他曾应译学馆之聘，担任讲授国文及西洋史的教习。

一九〇七年五月，因驻德公使孙宝琦之助，①随孙前往德国。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兼作家庭中文教师，并编译书籍，半工半读以自给。

翌年，进莱比锡大学。三年中，除选读哲学、文学、美学、人类学、文明史等学科外，曾选读实验教育学及儿童心理学，以及心理学概论、心理学方法、语言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等课程。他对于冯德（Wundt）教授所授心理学实验室一课，曾连续选修三个学期之久。②他还到维坎斯多弗一所新式中学参观，该校“午、晚餐师生共聚一堂，由一人读世界名人格言一则，以代宗教中之祈祷。每星期至少演奏音乐一次”。该校“重启发学生，使能自动研究”的教育方法，③给他以深刻的印象。

在德国期间，他一面攻读，一面著译，编写出《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等书，并翻译出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

辛亥革命前夕，蔡元培由德国经西伯利亚回国，在上海参加筹建中华民国的的工作。一九一二年一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任命他为改元后第一任教育总长。二月间，他被派去北京，任迎接袁世凯南来就总统职的专使。袁玩弄权术，拒不南下。他曾将洽谈经过撰写成《告全国文》发表。

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在北京继任总统，唐绍仪新任国务总理，蔡元培被坚留仍任教育总长。但为时不久，袁世凯即竭力攫夺一切国家大权，设法摆脱责任内阁。蔡元培愤愤地说：不能继续充当“伴食”的内阁阁员。他当即邀约同盟会会员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总长联名辞职，一同退出内阁。

他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

“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

①翰林院编检中愿游学者甚少，清廷遂搁置不办。后商得孙宝琦让他以使馆职员名义赴德，

孙并助以每月学费银 30 两

②据德国马克思大学档案

③蔡元培：《自写年谱》手稿

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①

他所主持的教育部，曾进行划时代的改革。他就任伊始，立即由南京教育部拟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于一月十九日通令遵办。这是中华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五月间，北京教育部在上述暂行办法的基础上，改订普通教育办法九条，通行各省，此项办法与清末旧制最大的不同之点是：

（一）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通称校长；（二）教科书须合于共和国宗旨；（三）废止师范、中学、小学读经；（四）小学注重手工科；（五）高小以上体操科注意兵式；（六）初小算术科自第三年起兼授珠算；（七）初小男女同校；（八）中学文、实不分科；（九）废止旧时奖励学校出身。②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他在教育部行政组织上创设社会教育司，并通令全国推行社会教育。这是因为他在欧洲多年，目睹各国社会教育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的人却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为提倡成人教育与补习教育起见，他“以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③这是社会教育在我国国家行政组织上确定地位之始。

他还主持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在开会词中，他着重阐明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不同之点，指出：“君主时代之教育……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现在此种主义已不合用，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等教育。”④

①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②参阅《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1912年2月1日出版）；及《民立报》1912年5月31日

③蔡元培：口述《传略》，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北大新潮社1920年9月出版

④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见《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1912年9月出版）

由于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因此他在教育部时，对这方面特别注意。民国元年公布的《大学令》，就是他亲自起草的。^①

他除了把北京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并提出严复为校长外，^②还预定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

清季学制，大学本科之上，有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他在《大学令》中改为大学院，即在大学里，增设各科研究所。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有入院资格。

各省原来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许多毕业生升大学有困难。他将此种学堂改为预科，附属于大学。

清季学制，大学，仿各国神学科之例，于文科之外，另设经科。他认为十四经中，《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没有再设经科的必要。因此，《大学令》中，废止经科之设。

他还认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应偏重文、理两科，所以，在《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称为大学；设医、农、工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称为大学。

推动华法教育与勤工俭学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选课听讲。一九一三年夏，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他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奔走鼓动。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发表《敬告全国同胞》书，^③并与吴敬恒等创办《公论》晚报，撰写《敬告各省议会》、《袁氏不能辞激成战祸之咎》等社论，呼吁祛除袁世凯。讨袁军事行动失败，他于这年九月间前往法国，从事学术研究。

一九一六年三月，蔡元培等联同法国名流学者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推选蔡元培（华方）、欧乐（法方）为会长，汪兆铭（华方）、穆岱（法方）为副会长，李煜瀛、李圣章（华方）、裴纳、法露（法方）为书记，吴玉章（华方）、宜士（法方）为会计。在发起会上，蔡元培讲述《华法教育

①参阅《大学令》，见《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1913年1月出版）

②见《政府公报》1912年5月号

③见《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